

2009年4月21日,离南京解放60周年还剩两天,石学鸿老人辞世,没能等到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日子。60年前的那天,隆隆炮声翻开历史新的一页,石学鸿也迎来命运的激变——从国民党公务员变成阶下囚,在牢狱里度过人生最美好的30年时光,重获新生后,他又成为中国的文化名人。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前,每个人都是小人物。当年留在南京的国民党人士,很多都经历过和石学鸿类似的命运沉浮。风雨60年后,记者近日走访了他们。



石学鸿:去世在“4·23”前两天

4月21日,南京解放60周年纪念日前两天,90岁的石学鸿在他那间名为“夙庐”的住所里悄然离世。石学鸿生前的身份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,二十多年来,他一直从事自己喜爱的书法、绘画与篆刻研究。但是,当他成为文史馆馆员的时候,已经是1985年,60多岁了。在1981年之前,他的身份是犯人——一个坐了30年牢的犯人。



去世前几天,石学鸿老人躺在床上接受快报记者采访

梅兰芳请他刻过印

就在石学鸿去世前几天,记者见到了老人,在一张阳光灿烂午后,南京城西一处简陋的居所里,时间正是阳春三月,春暖花开,可是90岁的石学鸿却卧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,形容枯槁,双目无神,不停地咳嗽,几乎喘不上气来,严重的肺部感染让他不能大声说话。据朱晓明介绍,父亲年轻时刻的篆刻技术在南京享有盛名,梅兰芳也托人请他帮忙刻印,甚至还给蒋介石刻过印章。

为了老母亲留在南京

石学鸿本来可以这样一直安静地玩着自己的金石,但是,历史的洪流汹涌向前,他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。在南京解放前夕,民社党负责人钱钧田邀请他一同赴台。那天下午,在梅园新村17号民社党总部,钱钧田将一张飞机票送到他手上,让他和其他民社党党员一起撤离南京。当时,与南京城内的许多人一样,石学鸿心里也是惊慌不定,不知将要发生怎样的事情。不过他考虑再三,还是决定留在南京。老朱晓明翻出父亲做参议员时的照片,年轻帅气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看上去英姿勃发。

有舍不得的感情,所以我还是希望留在这。有人害怕留下来共产党会对自己不利,我就不怕。虽然我在国民党政府做事,但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朱晓明补充说:“我爸6岁时,我的爷爷就去世了,但当时奶奶还在,他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,而像老母亲这样的家属,当时是没有条件离开南京的,他怎么也不会丢下老母亲。”就这样,石学鸿最终选择留在了南京。

当时,南京城内已经非常混乱,许多警察已经四散而逃,警察局形同虚设。当时吴贻芳出面组织了治安维持会,临时维持南京的秩序。因为石学鸿在南京有些名声,吴贻芳专门给他打电话,让他出面参与维持秩序,石学鸿应邀欣然前往。当年4月24日,他还代表民社党南京支部,与广大群众一起,参加了欢迎解放军进城仪式。南京解放后,他很少公开活动,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中。

朱晓明说:“当时我父亲也不再有什么大的奢望,只希望能过普通人的生活。”在许多文化界朋友的支持下,石学鸿在太平南路开了一家印社,一些友人经常去那里聚会,印社开了仅仅一年多,就被迫关门了,他被关进了牢房。

一封来信让他成了政治犯

为何石学鸿这么快就被关进牢房,并押了那么长时间呢?因为他确实犯了错误,并且,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严重的罪行。

石学鸿以前的一位叫孔君卫的同事随国民党去了台湾,而他的妻子与一对子女却留在了南京,无依无靠。于是孔托人给石学鸿带来消息,希望石学鸿能设法将夫人孩子送往台湾。

时隔多年,现在的石学鸿也不再有什么顾忌,他喘着大气,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当年所犯的错误,“男人已经离开了南京,只剩孤儿寡母在这里,看上去很可怜,我觉得不忍心,就答应帮他们。”那天下午,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摸到了石家,手里挽着一个孩子,身上还背了个孩子,这就是孔君卫的家人,石学鸿看了觉得很心酸。当时由南京去台湾非

常困难,必须经过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。石学鸿利用自己善于绘画的技术,制作了一个公章,伪造了一份允许离宁赴台的文件。由此,孔君卫的妻子孩子得以顺利到了台湾。

家人到了台湾后,孔君卫非常高兴,专门写来一封信,对石学鸿表示感谢,随信还寄来了一些钱。可是,就是这封信让石学鸿遭了殃。当时,这封信被南京有关部门截获,认定这是严重的通敌行为,决定对其展开审查。经过讯问调查,安全部门认定他是一个政治犯,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。他很快被投进监狱,最先是在羊皮巷附近的看守所,后来被关押到老虎桥监狱,最后又被转到龙漕监狱。等他最终出来的时候,已经是1981年,他已经从一个30多岁的壮年变成一个60多岁的垂垂老者。

石学鸿进监狱后,只剩下一家四口的生活。石学鸿进监狱后,只剩下一家四口的生活。石学鸿进监狱后,只剩下一家四口的生活。

出狱后成为文化名人

虽然石学鸿身陷囹圄,但他的篆刻能力引起了监管人员的重视。因此,即使是劳动改造,他的工作内容也与其他人不同,监管会安排一些篆刻或绘图的工作让他做。后来,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时,桥梁上的许多人物和字迹雕刻要求比较高,难度较大,有关部门想起了石学鸿,让他负责其中部分图案的设计工作。他设计的效果让专家们一致叫好,最后决定就采用他设计的方案。

1981年,刚从牢房中释放出来的石学鸿,已经是花甲之年,言行谨小慎微。朱晓明告诉记者:“他刚出来时,什么话都不敢讲,生怕惹祸上身。”不过,他出色的书画篆刻技艺引起了文化部门的注意,江苏省文史馆将其聘为馆员,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,直到这时,他终于又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。他好像要弥补自己这些年来浪费的时间,刻苦钻研,精心刻制了许多精美的印章,绘制了许多出色的画作,他的成就赢得了各界的关注与认可,1996年,他获得《世界书画艺术名人证书》。

换上解放军的军装才安心

解放前对中山陵的保护,尽心尽力。拱卫处卫士以及原先的陵园工人,共400多人,全部留用。刘维才和其他留用的守陵卫士们整编成一个连,叫二连,解放军派驻来的,则是一连,共同担负保护中山陵的重任。虽说被收编了,可穿的衣服还是原先国民党的军服,而一连的战士们,穿的则是黄绿色的土布军装。“他们挺客气,可我们就是觉得有距离,特别是看到他们穿军服,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,心里想,怎么不给我们发一样的衣服呢。”直到四个月后,重新整编,每个人都发了解放军的服装,穿上土布军装,大家觉得很神气。

那些沉浮在大时代的名字.....



最熟悉中山陵的刘维才

刘维才:一生离不开中山陵

1948年秋,19岁的刘维才离开老家安徽滁县,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。刘维才当上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拱卫处一等卫士。他没想到的是,半年后,国民党就放弃了南京,留下了他们这支特殊的国民党部队——守陵卫队。从此,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。今年已经80岁的刘老,回忆起南京解放前后的事情,还历历在目。

陈毅手书“保护中山陵”

刘维才离开家乡来到南京,刚好国父陵园的守陵卫队空了个位置,刘维才就去面试了顺利进了拱卫处第三中队。

刘维才很满意这份工作,吃穿不愁,就是环境相对闭塞,对于外面局势变化,守陵的士兵们并不清楚。

到了1949年初,国民党高官开始纷纷撤退,主管中山陵的行政院院长孙科,即孙中山的儿子,也要走了。临走前,他尽量动员卫士们能留守在中山陵,“毛泽东、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,不会为难你们的。”

最熟悉中山陵的人

1953年,刘维才调任中山陵园管理局办公室,当起了管理员,开始从事文保工作。1966年,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,政府花了100万元用于维修中山陵,刘维才也参与了这次大修工程。然而,这时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也开始了。中山陵一边在搞维修,另一方面又要搞“四旧”,刘维才心里那个别扭劲无法言说。没过多久,刘维才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,被下放到淮阴县韩畔公社第五生产队。直到1979年,刘维才才回到南京。回来第一件事,领导就让主持中山陵第二次大修工程,国家文物局的40万元已经到账了,就等着他回来,赶紧开工。

从守陵卫士,变成文保“卫士”。刘维才说,得益于他在拱卫处的那段经历,他每天都在山上四处巡逻,渐渐就成了对中山陵地区研究最透彻的文博专家。

侯鸣皋的父亲侯鸣皋,解放前在国民党励志社工作,是国民党庞大官僚体制中普通的一员。励志社是蒋介石的内廷机构,主要负责为蒋、宋办理一些宴会、娱乐、接待等事务,也负责接待国外政要人员,当时的社长是蒋介石本人,总干事是黄仁霖。

大时代的名字.....

侯鸣皋:“旧官吏”的帽子戴了很多年

侯琦今年已经70岁了,她是从新疆回南京探亲的。记者见到这位老人时,她不禁有些唏嘘。53年前,她还是南京八中的一名学生,品学兼优,是学生会主席,她自信能够考上一所名牌大学,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。但是,让她遗憾终身的是,因为她父亲侯鸣皋解放前是国民政府的官僚,她被判丢了上大学的机会。就在她高考结束的第二天,她的父亲就被捕了。随即,她与南京的130多名家庭出身相似的年轻学生,被送往新疆去“支边”,从事地质勘测工作。从此,她远离家人,独自一人在新疆生活、成家、扎根,直到退休。

励志社走出的文化人

侯琦的父亲侯鸣皋,解放前在国民党励志社工作,是国民党庞大官僚体制中普通的一员。励志社是蒋介石的内廷机构,主要负责为蒋、宋办理一些宴会、娱乐、接待等事务,也负责接待国外政要人员,当时的社长是蒋介石本人,总干事是黄仁霖。1932年,侯鸣皋才22岁,刚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,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他也梦想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与光明的前途,于是,他考进了国民党励志社,负责演艺、文体、接待等工作。在这里,他参与举办了多次宴会,组织了多场话剧演出,尽职尽责。美国军事顾问到中国来,他负责接待,他是在等解放军进城,于是他立即组织了总干事黄仁霖的器重。凭着自已的聪明才干,到解放前,他已经做到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。

侯鸣皋的头脑灵活,在励志社工作期间,曾自己做过钢材生意,后又利用自己掌握的农场,经营农副产品,发了一笔财。到了解放前,他在南京的太平南路又有了自己的一片商店。可以说,他们一家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。但是,侯鸣皋的比来总是有些不安,时时关注着时局的变化。侯鸣皋的小儿子侯方生今年四十多岁,眉宇间颇有父亲的一些神采。他拿着父亲的照片告诉记者:“他虽然在那个环境里工作,但每个人都发着思想进步的文人。”侯鸣皋年轻时就很喜欢阅读,通晓英语、俄语,先后创作、导演了多部戏剧作品,并翻译了国外的一些优秀剧作。他经常与一些进步的作家与演艺人员接触,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,思想进步,也很爱国。他后来跟闺女们讲过,当时他最希望国共能够和平谈判,早日结束争斗,让人民能得到安宁。

但是,在历史潮流面前,个人的心愿微不足道。不愿撤离南京

1949年4月,南京城里人心惶惶,励志社也开始谋划往上海转移。那天,在中山东路励志社总部,黄仁霖与侯鸣皋进行了一次长谈,主要意思是希望他跟着一起撤走,但侯鸣皋此前早有打算,他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,另外,在南京有自己的家人和一份不小的产业,他都不愿走下,因此他拒绝了黄仁霖的提议,谈话不欢而散。

黄仁霖离开南京前,再次找到侯鸣皋,这次的话完全不一样了,他说:“你留在这里也好,把励志社的财产看管好,看看下一步事情怎么变化,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。”这活正中侯鸣皋下怀,他满口答应。随后,黄仁霖安排他送来了事先已经制好的任命书,任命侯鸣皋为励志社代理总干事。分手时,黄仁霖意味深长地看了侯鸣皋一眼,转身离去。

侯鸣皋本确实想保护好这些财产,不过他不是为国民党保留的,他是在等解放军进城,于是他立即组织了总干事黄仁霖的器重。凭着自已的聪明才干,到解放前,他已经做到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。

侯鸣皋的头脑灵活,在励志社工作期间,曾自己做过钢材生意,后又利用自己掌握的农场,经营农副产品,发了一笔财。到了解放前,他在南京的太平南路又有了自己的一片商店。可以说,他们一家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。但是,侯鸣皋的比来总是有些不安,时时关注着时局的变化。侯鸣皋的小儿子侯方生今年四十多岁,眉宇间颇有父亲的一些神采。他拿着父亲的照片告诉记者:“他虽然在那个环境里工作,但每个人都发着思想进步的文人。”侯鸣皋年轻时就很喜欢阅读,通晓英语、俄语,先后创作、导演了多部戏剧作品,并翻译了国外的一些优秀剧作。他经常与一些进步的作家与演艺人员接触,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,思想进步,也很爱国。他后来跟闺女们讲过,当时他最希望国共能够和平谈判,早日结束争斗,让人民能得到安宁。

但是,在历史潮流面前,个人的心愿微不足道。不愿撤离南京

1949年4月,南京城里人心惶惶,励志社也开始谋划往上海转移。那天,在中山东路励志社总部,黄仁霖与侯鸣皋进行了一次长谈,主要意思是希望他跟着一起撤走,但侯鸣皋此前早有打算,他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,另外,在南京有自己的家人和一份不小的产业,他都不愿走下,因此他拒绝了黄仁霖的提议,谈话不欢而散。

黄仁霖离开南京前,再次找到侯鸣皋,这次的话完全不一样了,他说:“你留在这里也好,把励志社的财产看管好,看看下一步事情怎么变化,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。”这活正中侯鸣皋下怀,他满口答应。随后,黄仁霖安排他送来了事先已经制好的任命书,任命侯鸣皋为励志社代理总干事。分手时,黄仁霖意味深长地看了侯鸣皋一眼,转身离去。



胡念恭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

胡念恭:几句牢骚让他入了党

很多资料上这样记载:南京解放的战役中,江宁要塞的狮子山炮台台长胡念恭率部起义。记者找到了目前住在总参干休所的胡念恭老人,87岁的胡老很诚恳地纠正:由于提前泄密,他并没有能够按原计划起义,但是做了些“手脚”——他声称弹药受潮,没法打出去了。因此,整个战役中,狮子山炮台从始至终,一炮未发。一切进行得沉着冷静。就在一个多月前,胡念恭刚刚秘密完成一次重大的身份转变—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党。

解放前“火线”入党

江宁要塞,是江边的险要之处。渡江战役前,共产党已经悄悄在这里布下了三条线。其中一条线,就是胡念恭。他的大哥就是江宁要塞司令胡雄。1946年,在江宁要塞任参谋的胡念恭,遇见了小学时的家庭教师苏漱真和卢明文。当时国民党内部分裂,胡念恭在老师面前忍不住发了不少牢骚。这些话,让老师上了心,认为他是有进步思想的青年。

1948年8月,胡念恭突然接到苏老师的信,约他星期天见面,劝他投身革命。胡念恭考虑了一下。过了一星期,他还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,配合某个部队一同起义。但起义的细节,并不清楚。后来才知道,要准备配合的就是驻南京的四十五军九十七师,起义之事因为泄密,没能按计划进行。

江宁要塞里,地下党员只有他一个,要公开反抗或策划起义都相当困难。胡念恭决定千方百计也得找个借口,这时,江宁要塞命令各炮台检查火炮和弹药。胡念恭查了,全是完好的,他却报告说,火炮不能射击,还把曾沾过水的受潮弹药送给司令看。司令知道这些火炮还是抗日战争留下来的旧武器,对报告深信不疑。这样,就为狮子山炮台不开炮,制造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。

4月23日凌晨,江宁要塞接到命令,撤退的首要向解放军打炮掩护28军80师撤退。江宁要塞在司令胡雄的直接指挥下,向江北浦镇方向胡乱发射了8发炮弹。江宁要塞守备总队副大队长李祥麟是共产党的另一条线,他偷偷命令这8发炮弹不要安装信管,这样炮弹只有响声,不会炸伤人,成了礼炮!

参与组建南京炮校

按上级命令,胡念恭随着部队沿宁杭公路撤退。到了宜兴,遇到了解放军,成为“俘虏”。5月上旬,胡念恭回到南京。

不久,胡念恭和另外几个同事,分到上海的三野特和纵队司令部研究所。同年8月,三野各个机关搬到南京,特纵司令部研究室与汤山特科学校合并,成立南京炮兵学院。胡念恭记得,炮校初期的教员,几乎全是来自俘虏和起义军官担任。其中只有一个共产党员,就是他。

因为他是党员,有出差不类的事,一般都是派胡念恭去。组织上信任,他工作也积极,还被评为模范。

然而,文革的时候,胡念恭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。负责审查他的专案组说他是“假党员”,入党的时候,没有填写申请表,也没有正式的宣誓。这个问题很难说清,因为当时情况特殊,地下党员都是秘密的,很多程序只能简化。但到了后来就成了死无对证。幸好,胡念恭还有证人,出来保住了他。

可是,情况越来越糟,苏沪两位老师也被打成了反革命,自然牵连到了胡念恭。大哥在台湾任国民党高官的事,也被翻了出来。胡念恭又被定为“国民党残渣余孽”。这段时间,他接受劳动改造,批斗……还被开除党籍。一直到1975年,才得以平反。

现在说起这些事,胡老的心绪已经非常平和,轻描淡写一带而过。如今,他住在军队干休所里,里面有不少南京炮校的熟人,大家在一起同叙昔日趣事,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

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干部合影 前排右三为侯鸣皋